

## 一般論文

### 哲君或民主公民？關於通識教育的兩個理念

許文柏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嘗試分別從兩位美國哲學家對美國高等院校中通識教育處境的反省，來檢視通識教育的可能意涵，已故的美國政治哲學家 Allan Bloom 認為應該將古希臘雅典學院精神在美國高等學院中重現，但另一位哲學家 Martha Nussbaum 卻認為這種理想忽視了當前教育環境所面對的新局勢：全球多元社會，反而應該以培養具有多元寬容精神的世界公民為人文教育的最高目標。Allan Bloom 認為美國高等教育院校是培育「自然貴族」的養成所，然而 Martha Nussbaum 卻認為「世界公民」才是高等教育應當追求的目標。本文認為 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分別強調的這兩種觀點都相當具有代表性，值得加以探討，因此首先從 Allan Bloom 的《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這本書的內容來分析其對博雅教育的特殊觀點，其次，說明 Martha Nussbaum 在《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 一書中對美國高等教育前景的關注與檢討，來整理出高等院校中博雅教育的可能前景，接著，進一步分析 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的這兩種觀點是否可能調和，並以討論「教育與學習這種活動究竟代表什麼樣的意義？」這樣問題來嘗試提出一種可能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里奧·史特勞斯、通識教育、自由教育、哲君、世界公民



## 前言

近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問題層出不窮，包括「頂尖大學計畫」的合理性、大學評鑑與教師評鑑制度所衍生的負面效應、高學費政策的公平性等，這些問題的爭議在在都突顯出台灣的高等教育已經面臨自我突破的門檻，而這種自我提昇的契機，在於找出以下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大學？」或者說：「大學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大學教育的目標與精神若無法確立，而全力投注於論文篇數的增加來提昇大學的全球排名次序，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短視作法。台灣的大學體制與操作模式，基本是對美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照搬照抄，但可惜的是，我們卻很少關注到美國大學校園中對大學體制與目標的深刻反省，本文嘗試從兩位先後執教於美國學術重鎮芝加哥大學的重要學者Allan Bloom與Martha Nussbaum，根據他們對於美國高等教育議題的反省，來分析整理出高等教育的目標，特別是通識教育在高等教育體制中的角色，希望這些討論對於台灣現行高等教育目標與社會角色的省思，能有所裨益。簡言之，Allan Bloom認為美國高等教育院校是培育「自然貴族」的養成所，然而Martha Nussbaum卻認為「世界公民」才是高等教育應當追求的目標。但是這兩種看似南轅北轍的觀點，是否有調和的可能性？本文認為若重新回到「教育或學習的這項活動究竟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這個問題的思考，或許能夠提供跳脫這兩種思考模式侷限的可能方式，本文認為同樣出身芝加哥大學的Matthew B. Crawford在其《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Shop Class as Soulcraft)一書中所提出的深刻論點，也許提供了深具啟發性的另類思考方式。

## 壹、大學作為自然貴族的養成所

Allan Bloom 對當今美國大學教育的分析與批判，清楚地呈現在《美國精神的封閉》這本使得美國高等教育場所成為文化戰爭的場域的暢銷書，該書的副標題很清楚地突顯出整本書的中心題旨：「高等教育如何導致民主的傾頹並使今日大學生的心智枯竭？」。甘陽曾經對這種史特勞斯學派的自由教育思想作了細緻的分析（註1），他認為 Allan Bloom 這本暢銷書所引發的論辯其實可以歸結為以下的問題：「大學生應該讀什麼樣的書？應該接受哪一種教育？」（甘陽：2003：47）。Allan Bloom 提到：「我書中描述的前景是不可能被大眾所容忍，我因為沒提出一種療方而遭受批判，又因為開出了療方而備受讚譽」（Bloom,2003:301）。他在反省美國高等教育的困境時，首先指出美國當代社會的美德或行為的基本原則，已經從憲法所揭櫫的「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轉為「真理的相對性」，以「開放思想」取代了「自然權利」。



Allan Bloom 認為大學教育會受到某種激進平等觀的威脅，這是因為民主必然帶來媚俗，而且大學本質上是貴族制的 (Bloom,2003:329-330)。他說：「現代大學的基本前提是，思想自由可以存在於不受公共激情威脅的學術社群中」，它追求的是真理，「是公民社會的獨立孤島，是至高無上的文字共和國」。但這種高等教育組織形式也呈現出某種內在的矛盾：試圖將「卓越」與「平等」、「理性」與（被治者的）「同意」加以結合，這種發展無可避免地將會導致民主的平庸。

Allan Bloom 這種菁英論的教育理念所承繼的是其老師史特勞斯 (Leo Strauss) 所揭櫫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理想，他說這種自由教育的目的在於：「致力於塑造完美品格、實現人類卓越的自由教育，在於喚醒每一個人自身的卓越和偉大的氣質。」(Strauss,2010:5)，但實現的方法為何？就是閱讀經典，也就是研習偉大的著作，他說：「自由教育就在於足夠謹慎地研讀那些最偉大思想家所留下的經典著作」(Strauss,2010:1)。史特勞斯說：「自由教育在於聆聽最偉大思想家之間的對話，...偉大思想家用獨白表達他們的思想，我們必須把獨白轉換成一種對話...他們即使在寫對話的時候，也是在獨白自己的見解」(Strauss,2010:5)，因此閱讀經典其實就是讀者在自己的腦海中進行獨白與對話之間的不斷轉換，以一種謙遜與勇敢的態度，不斷地檢視自己對偉大經典文本的理解之過程，而去體會思想的崇高性。

現代民主制的基礎是大眾文化 (mass culture)，這種文化淺薄而平庸，因此史特勞斯認為：

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毒劑，它要對抗大眾文化的腐朽，要糾正其固有的只生產『沒有靈魂與洞見的專家以及沒心肝的酒色之徒』的傾向。自由教育是我們試圖從大眾民主向原始意義上的民主攀登的梯子；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眾社會創建貴族政治必然要付出的努力。自由教育召喚著大眾民主社會中那些仍然用心聆聽人類偉大思想的成員 (Strauss, 2010:4)。

史特勞斯對自由教育作出這樣的結論來：

自由教育在於不斷地與最偉大思想交流的過程，...它要求我們與知識份子及其敵人喧囂、浮躁、輕率和低劣的浮華世界徹底決裂。它要求我們鼓起勇氣，把普遍接受的觀點僅僅當成是某種意見，...自由教育就是為了把人從庸俗中解放出來。自由教育就是提供給我們對美好生活的體驗。(Strauss, 2010:7)



史特勞斯對於自由教育意涵的解釋，可以確定他認為「自由教育」就是「自由人的教育」，為了能夠有閒暇去從事政治與哲學兩種活動，自由人（free man）只能是擁有一定財富的紳士（gentleman），擁有一定財富使得這位未來的紳士擁有閒暇，「人透過教育成為紳士...，紳士關心最重要的問題，關心那些本身值得嚴肅對待的事物，關心靈魂與城邦的良好秩序。對潛在紳士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培養良好的性格與品味。」（Strauss,2010：10）。紳士是城邦的政治統治者，而城邦是由紳士與平民組成，雖然哲學家也居住在城邦內，但是他醉心的是對永恆事物的思索，對史特勞斯來說，哲學比政治層級更高，因為政治在於明確區分目標的高尚與否，而哲學之所以超越政治，正是因為政治作為某種人類行為，必然都會飄逝或腐朽，但哲學所思索的是存在恆久不變或不朽的事物，譬如人類靈魂的自然秩序（Strauss,2010：13），因此史特勞斯認為「自由教育，特別是人文教育（liberal arts）是為哲學準備的。這意味著哲學超越紳士品格。紳士會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某些關於最重要問題的觀點，哲學家則要對此進行調查和盤詰。」（Strauss,2010：13），換言之，針對紳士的自由教育其實是哲學教育的預備，而後者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哲學家，城邦的正義只能由哲學家擔任政治統治者來保證，這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提出的「哲君」思想。

Allan Bloom 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批判，就是承接他的老師的這種自由教育的思維。其實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出版之前，Allan Bloom 已經開始反省美國高等院校中的通識教育危機，而分別寫就〈自由教育的危機〉（1966）以及〈大學的民主化〉（1969），Allan Bloom 於 1988 年在哈佛大學所發表的〈西方文明〉此一演講中提到，他自己時常被所謂的民主派人士批判為「菁英主義」，但他反唇相譏這些人其實是基於某種內疚感而導致這種言行不一的情況，這是因為美國當代民主政體的道德特徵是「平等」這種價值，任何違反這種價值立場的行動與主張都將遭到撻伐，包括高等教育的課程內容都是如此，民主派人士進而以這種立場對學院中的經典教育進行道德與政治檢視，試圖將古典智慧從階級、性別與種族偏見中解放出來。但 Allan Bloom 認為這種做法剛好是在摧毀西方哲學傳統的根基，他說：「理性面臨兩種威脅，一種是認為人們已經瞭解最重要東西的真理，另一種則是說那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真理不存在。這兩種看法對哲學來說都是致命傷，第一種主張認為追求真理沒必要，第二種說這種追求不可能。我認為蘇格拉底的無知之知是所有哲學的起點。」（Bloom, 2003:300）。

Allan Bloom 清楚地表示他在 1987 年所出版的這本書，其研究樣本主要是鎖定美國最好的前二十或三十所大學，這些大學的學生具有智商高、物質生活優渥、思想自由等特質，是「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識教育的優勢，在道德和思想上對國人發揮最大影響的學生」（Bloom ,2007:4），這些學生就是 Allan Bloom



所謂的「民主版本的貴族」(a kind of democratic version of an aristocracy) (Bloom, 2003:315)，他認為「大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貴族制的」(the university is in some sense aristocratic in both the conventional and natural senses of the term) (Bloom, 2003:329)。

他認為「教育會威脅到哲學，因為哲學思考是孤獨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著群眾」(Bloom: 2007:2)，哲學所問的是「人是什麼」這類的大哉問，而「通識教育的確切含義是，它幫助學生對自己提出這個〔人是什麼〕問題。讓他們明白答案並非一目了然，亦非無從尋覓；不去持續地關注這個問題，嚴肅的生活就無從談起。」(Bloom, 2007:2-3) Allan Bloom 還說：

我們長期缺乏確切的答案，所以才會去瞭解並思考各種可供選擇的答案。通識教育使我們得以瞭解這些選擇，其中有許多悖於我們的天性與時代。受過通識教育的人能夠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吹捧的答案，這並不是因為他固執己見，而是因為他知道另一個答案更值得考慮。」(Bloom :2007:3)，「只有極少數人會獻身於追求獨立精神。通識教育就是專為這些人而存在的。他們會成為人類運用自己偉大才智的典範，從而也能使我們大家獲益，這並不取決他們做了些什麼，而取決於他們是什麼人。」(Bloom, 2007:3)

因此對於 Allan Bloom 來說，大學教育所追求的多樣性，掩蓋了真正重要的教育目標。他說：

多樣性不僅僅是迴避討論什麼是善的一種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在自由社會中，許多高雅或高貴的生活方式必然為人們的多樣選擇而存在著。但是將焦點放在多樣性本身就是自欺欺人。因為，一個嶄新、言數的生活方式必能出現並維持下來，其創立者必須相信它的真理性高過於其它的選擇；因此，它們就不可能認為想要的東西就是多樣性。這種追求絕不會是對多樣性的追求，而必然是對真理的追求，這是一種在最高善和生活目的上的真理。多樣性會照看好它自己的，會賦予人不同的才能與性格。但我們絕不要老是在多樣性上喋喋不休，卻不怎麼顧及在人與人之間的真正差別。(Bloom:2003:326)

甚至，他還認為：

真正唯一的多樣性來自於在終極目的上原則的不同，譬如，在救贖、智慧或榮譽是否最好這個問題上嚴肅的思考和信念。這是我們所缺乏的，而維持這些對最高形式的替代物的意識，就是大學的作用所在。...我們的年輕



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思想或行動。但爲了非比尋常的行事，就得有思想，這是他們所缺乏的。他們本來可以接近過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爲傲的的典範，但他們卻沒有被教會認真地去對待它們，就像對待他們自己充滿活力的可能性一樣。這正是我們的教育體制的問題。(Bloom, 2003:326)

1980年代晚期在美國大學學院中的課程改革，對Allan Bloom來說，是對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是「對已故歐洲白種男性作者」所謂「經典」著作的揚棄（註釋：Martha Nussbaum也認爲必須重新調整我們對經典的看法，她說：「我們發現，要提倡世界公民的目標，則文學教育最好在著名的西方文學『經典』(canon)外增添新的著作，並且以審慎和批判的精神來考量一些常用的標準文本。」，Martha Nussbaum雖然說的是文學，但也可以適用在哲學領域。(Nussbaum,2010b:111-2))，但這種批判與其說是知識的，不如說是它是一場權力鬥爭(Bloom, 2003:306-7)。對Allan Bloom來說，這些經典猶如柏拉圖《理想國》所說的洞穴外的光芒，這些光芒使得我們不至於盲目，Allan Bloom爲了駁斥認爲經典是某種「歐洲中心主義」取向的指控，他舉了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爲例，亞里斯多德對中世紀哲學的貢獻卓著，將經院哲學從啓示推向理性，甚至從伊斯蘭思想家Averroes對亞里斯多德著作的評註中，可以看出這些思想家在解讀經典時，所關注並非西方與非西方的差異，而僅僅將亞里斯多德當作是一位哲學家從而去探究其哲學的可能性(Bloom,2003:308-9)。

對人類偉大經典的重視不再，顯示了自由教育的危機。而這個自由教育的危機有很大一部份的原因來自於美蘇競賽下，美國在科技水準落後下所產生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促成的美國大學教育的技職化潮流以及自然科學至上的心態，從而使大學的原本是爲了追求幸福生活而質疑自我慣性及流俗與探究正義本性的崇高目標被放棄了，大學生開始成爲無心與不思考的一群(Bloom,2003:313-323)。那經典教育爲何如此重要呢？Allan Bloom認爲經典「包含著許多對人的本性最深刻的反思，與它們接觸是富予啓發的知識上與道德上的經歷，它們對那些被引進門檣的人有巨大的解放作用。」(Bloom,2003:323-24)。經典所呈現的思想傳統，除了能提供一種整全性的模型來關照人類社會所面臨的重要且永恆的問題，經典「就使讀者涉入對幸福生活的關注來說，這種書所提供的不僅僅是知識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Bloom,2003:324)，Bloom甚至認爲自由教育其實就是經典教育，他說：

自由教育...主要在於認識最重大的人生選擇。這種教育很大程度上致力於研究過去最深刻的思想家，因爲他們的著作構成了我們爲了保持教化而必須保存的學識主體，因爲任何嚴肅的新東西都必須根基於它或考慮它。(Bloom,2003:336)



而學院中普遍存在的激進平等主義所形成的民主的激情氛圍，除了導致某種反智的情緒外，還會進一步戕害大學精神。Allan Bloom 說：

新的呼籲是開放入學管道。所有公民都必須上大學，每個人都必須被允許闖入知識的殿堂。而這實際上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從大學畢業，因為人們很快將會發現在這個學生權力高漲的年代中，讓一群大學生不及格是不可能的。接著就是標準必須被降低，甚至完全被放棄。(Bloom, 2003:324)

他對現今大學教育的批判是：

大學已經證明它自己無力教授學生何謂幸福生活，因為那是我們大學裡任何一部份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去討論的一個主題，它不屬於任何一個科系或任何一個將科系組合起來的群體。我們教授的教育是專業化、技術化的，舊式的人文教育或多或少摻和在其中，但不會真正被重視或滲透在這種專業學科中。(Bloom, 2003:339)

這種情況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虛無主義(nihilism)，「虛無主義是過去所有東西臨死的反應，在缺乏令人信服的價值天平的情況下生命的無意義感的表達，是生命中最核心部分已經死去，而對徒具的無生命的軀殼加以摧毀的努力。(Bloom, 2003:342)」，而且「虛無主義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其最顯著的表現並不是缺乏堅定的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亂。人們不再相信靈魂中多變而相互衝突的各種傾向有著自然的等級，用來代替自然的傳統也已經崩潰」(Bloom, 2007:153)。Allan Bloom 認為這種虛無主義就是歐陸哲學中尼采的存在主義（與激進歷史主義）、新左派與韋伯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奇怪結合(Bloom, 2003:342)。而尼采是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Allan Bloom 說：「西方危機的異常之處是，它相當於一場哲學危機。...尼采是這場疾病最深刻、最清晰也最有力的診斷者，他認為，對於我們來說，有一種合理的基礎上摒棄理性的內在必然性，因此，我們的政體注定難逃厄運。(Bloom, 2007:153)」

因此，自由教育最重要的學科，應該是可以提供評價標準與認識自然本性的學問，那就是「哲學」。

人若想成為完全的人，他不能只滿足於自己的文化所給予的東西，這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透過洞穴影像和把我們描繪為洞穴囚徒所要表達的意思。文化就是洞穴。他沒有建議人們走向其他文化以克服洞穴的侷限，自然本性應該成為我們判斷自己和其他民族生活的標準。最重要的人文學科是哲學而非歷史學或人類學，原因便在這裡。(Bloom, 2007:13)



大學正是貫徹蘇格拉底精神的場所 (Bloom, 2007:220-221)。Allan Bloom 認為：「蘇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學)體驗的性質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是大學的靈魂」(Bloom, 2007:222)「哲學不是教條，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完全投身於這種生活方式的極少數人是大學的靈魂。無論從原則上還是從歷史事實上來說，這一點千真萬確。大學逐漸成為人們從哲學家的教誨中得到啟發和示範的地方。哲學及其對理性的沈思生活的演示，使得學術和每一個學科成為可能，並且或多或少自覺地為它們注入活力。如果這些範例失去生命力，或被沒有此種體驗者壓倒，大學就會走向沒落甚至遭到毀滅」(Bloom, 2007:225)。

「民主取消了哲學的特權。...哲學不再是一種生活方式，也不再是至高無上的科學。」(Bloom, 2007:326)，哲學的重要地位也因為學科的專業分工而受到進一步的削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根本就不重視經典，甚至包括人文學科在內都對經典閱讀不再關注，Allan Bloom 說：「通識教育及經典文獻研究的大多數積極的支持者都是人文學者」。人文學者遭到來自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左右夾擊，已逐漸失去立場與信心。

## 貳、大學作為世界公民的民主教育場域

在 Allan Bloom 的著作出版十年後，由 Martha Nussbaum 精心完成的《培育人性》出版了，這本書從內容看來，Martha Nussbaum 隱然有與 Allan Bloom 之間對話甚至是駁斥後者的用意在(註釋：這兩本著作都討論了民族、種族、性行為、性別與宗教，當然這可能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些議題是大學教育與校園中一定要面臨的關鍵議題。)。Martha Nussbaum 在該書的結論這樣說：「他們必須透過傳統來增進他們的思考，不過，傳統的這個好處也包括了：必要時必須批判傳統，他們不會只因風俗的長久而推崇風俗，也不會把存在了很久的東西等同於必然的或『自然的』東西」(Nussbaum,2010:368)。她又提到「紳士教育的這種古老想法的捍衛者力促我們的學院與大學，要專注於把我們自己傳統中偉大美好的東西傳遞給下一代，而不要專注於蘇格拉底式以及普世主義的目標」(Nussbaum,2010:369)。這些說法顯然是針對 Allan Bloom 的說法而發的，因此她將 Allan Bloom 的自由教育理念稱為「紳士版本的人文教育」(gentleman's model of liberal education)，而將自己的主張稱為「世界公民版本的人文教育」(the world-citizen model) (Nussbaum,2010:372)。Martha Nussbaum 這種對自由教育的分類方式，相當於他所謂 Seneca 時代的兩種自由教育的觀念，Allan Bloom 這種觀念是舊的自由教育思維，認為「所謂教育是自由的，即『合於自由的』(fitted for freedom)，意味著教育是提供給那些有家有業、生而自由的紳士們的，這種教育把菁英納入他們自己社會確立已久的傳統中；它追求持久與忠貞，並且不鼓勵批判性反省。」(Nussbaum,2010:367)，而 Martha





Nussbaum 較心儀的自由教育的理念是「只有當教育能夠培養出自由公民時，教育才是真正『合於自由的』；這時候公民之所以自由，不是因為財富或出身，而是因為他們可以說自己的心智是自由的」(Nussbaum,2010:367)。

Martha Nussbaum 在 1987 年針對 Allan Bloom 的前述著作寫了一篇書評，篇名是「非民主的前景」(Undemocratic Vistas)(註 2)。相對於 Allan Bloom 對美國高等教育前景的悲觀思考，Martha Nussbaum 樂觀多了，Martha Nussbaum 之所以樂觀的理由是建立她對全美國 15 所焦點大學通識教育環境的研究分析(註 3)。在《培育人文》一書中，Martha Nussbaum 分別從「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Socratic self-examination)、「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與「敘事的想像」(the narrative imagination) 等三個角度，來分析美國高等院校中通識教育的現實情境，但從 Martha Nussbaum 的論證架構看來，這三者中「世界公民」才是最終目標，「蘇格拉底式的哲學思維」以及「文學想像所培養的理解與寬容」是成為達成這個目標的條件。對 Martha Nussbaum 來說，人文教育是民主教育的一個環節。她說：「我們希望藉由複雜的相互理解和個人的自我檢驗，來使公民們能彼此交流，建立一個真正能夠慎思反省的民主文化，而不只是各種未經檢驗的偏好的相互碰撞而已」。(Nussbaum,2010:368)

因此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問題：究竟「世界公民」與「民主公民」的概念有何差異？本文的基本主張是認為「世界公民」是「民主公民」的概念延伸，Amy Gutmann 的論點頗能掌握其概念核心意義，她認為雖然 Martha Nussbaum 希望將公民教育的目標定在培養「世界公民」上，其實是「世界公民」與「民主公民」並非兩種互斥的選項，「只要民主公民身份承諾尊重世界各國的個體尊嚴與權利」即可(Gutmann,2010:338)。

根據 Martha Nussbaum 在《培育人性》一書的論述，可以看出「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與「敘事的想像」都是為了培育「世界公民」而準備的，所以以下本文也打算依照這種順序來整理 Martha Nussbaum 關於通識教育的論點。

首先是，「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的能力。

Martha Nussbaum 強調的是蘇格拉底在《理想國》中如何透過與各方論辯來表達出不輕易追隨流俗的態度，但她也認為蘇格拉底的教育目標，特別與公民教育的關聯是不清楚的，除非從她認為繼承了蘇格拉底精神的古羅馬斯多葛學派的著作才可以看出來，她從後者的著作中整理出蘇格拉底教育的四個重點原則來：1.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是給每一個人的；2.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應該配合學生的環境與脈絡；3.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應該是多元的，亦即關心各種不同的規範與傳統；4.蘇格拉底式的教育必須確保書本不會變成權威。Martha



Nussbaum 得出這四種原則，顯然是基於對蘇格拉底哲學的一種特定理解（註釋：Martha Nussbaum 的對蘇格拉底哲學精神的這種理解也突顯出 Martha Nussbaum 與 Allan Bloom 的最重要差異，本文將在第三節在比較兩者差異時再詳細說明。），Martha Nussbaum 所謂的蘇格拉底式思辨的主要精神，「不在於強調迅速回應的能力與坦承陷入困惑的美德，相反地，是靜默與內省性的探索」，目的在於過一種自我省察的人生（the examined life），而以追求「倫理上的卓越」（ethical excellence）為目標（莊世同：2005：75）。為了強化學生這種自我批判的態度，Martha Nussbaum 認為應該從課程設計著手，去嘗試將蘇格拉底的論辯精神融入到某些哲學、倫理學與道德推理的課程中，所以這一學習目標主要是蘇格拉底鼓勵提問、檢驗與思考的方法及態度。而這種態度與人文教育有何關連？Nussbaum 說：「蘇格拉底很清楚的是，要有一個堅強的民主、要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則論辯不可或缺。為培養反省的和慎思的民主，真正以公共利益為念的民主，而不僅僅是各種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市集廣場，我們就必須生產出具有蘇格拉底式能力的公民，能夠為自己的信念說出道理來的公民。」（Nussbaum,2010b:30）

其次是，文學敘事所培養的想像力。

Martha Nussbaum 在《詩性正義》（Poetic Justice,1995）一書中，認為文學想像力才是培養世界公民這種通識教育目標的首要工作。Martha Nussbaum 說：

文學想像是公共理性（public rationality）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部。我相信，如果主張用設身處地式的想像來代替以規則來主導的道德推理，將是極為危險的，我也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事實上，我之所以為文學想像做辯護，正是因為，對我來說，它似乎是某種倫理立場的要素，而這種倫理立場要求我們要將自己與那些生活方式與我們有很大差異的他人幸福聯繫起來。...另一方面，某種對人類尊嚴的無私尊重將無法觸及到真實人類，除非人們能夠運用想像進入陌生他人的生活之中，而且具備與這種參與相關連的情緒（Nussbaum,2010：7）。

首先，Martha Nussbaum 認為相對於歷史對事實的關注，文學更關注的是事實背後的各種可能性，因為文學敘事能夠突顯出（作者與讀者所處的）各種情境對情感與內在世界的影響，特別是小說這種敘事形式，具有某種將特殊情境與情感普遍化的效果，從而培養了做為公民所需要的同情與理解，Martha Nussbaum 認為這並非只是一種想像，而是早就出現在美國的文化傳統中，體現在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作與詹姆斯（William James）與杜威（John Dewey）的哲學作品中（Nussbaum,2010a: X I I I）（註4）。惠特曼認為文學藝術家是民主政治的公民之無與倫比的教育者，詩人是「民主之光」，可以作



為裁判，「詩人不僅僅提供抽象形式的考量，他還提供公正的裁判，適合於特殊個案的歷史複雜性與人類複雜性的裁判。」(Nussbaum,2010a:120) 做為裁判的詩人可以獲致「詩性正義」，這是因為「為了達到完全理性，裁判必須同樣有能力進行幻想和同情。他們不僅必須培養技術能力，而且也應該培養包容人性的能力。如果缺乏這種能力，他們的公正就將是遲鈍的，他們的正義就將是盲目的。」(Nussbaum,2010a:171)

而她想要訴求的是，透過描述一種人文主義的公共推理觀念，呈現出敘事文學在表達與培育這種觀念對公共生活的正面激勵作用(Nussbaum,2010a: X V III-X I X)。Martha Nussbaum 借用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用法，就是一種明智旁觀者 (judicious spectator) 的眼光 (Nussbaum,2010:23)。

Martha Nussbaum 主要是認為當前社會的主流思維是一種「經濟學的效益論」(economic utilitarianism) 所籠罩，必須要有某種足以與這種效益論形式鼎足而立的對抗甚至是顛覆的力量，那就是「文學」，文學可以提供不同的世界觀與生命感受 (Nussbaum,2010: 12)。Martha Nussbaum 如此描述文學敘事，特別是小說的社會作用：

我們從來不能確定我們所觀察到的形體的心靈活動；我們只能在寬容的理解和無情的理解之間做出選擇。通過進入或者暢想心靈中的偉大慈愛，將會培育一種對世界寬容的理解。就像小說提出的，這種理解不僅是適宜作為一種我們感受到的對人類一般行為的解釋，而且這種理解也是更好生活方式的起因 (Nussbaum, 2010: 63)。

Martha Nussbaum 把這種文學想像力稱為「幻想」(fancy)，其中包括以下幾種能力的整體呈現：

它賦予感知到的事物以豐富和複雜意義的能力，他對所見事物的寬容理解；它對想像完美方案的偏好；它有趣和令人驚奇的活動，因為自己本身而感到愉悅；它的溫柔，它的情欲，它對人必將死亡這一事實的敬畏。這種想像...是對一個國家中平等與自由公民進行良好管理的必要基礎...。有了它，理性就將為一種看待事物的寬容觀點所指引，理性就是有益的，離開了它，理性就是冰冷和無情的 (Nussbaum, 2010: 69-70)。

當然，Martha Nussbaum 不會天真地以為只要強化吾人的文學想像力，人類社會的偏見、仇恨、歧視與冷酷就會消失不見，而是藉由一種文學幻想來補償制度的缺陷。Martha Nussbaum 是這樣說的：



...要更穩定且更人性化地培養教養；不是要用想像去取代客觀的制度結構，而是要建構制度，以及建構一些制度性的參與者、一些能夠藉由制度化的堅固保障而能更完美地具有同情性想像的洞見的參與者。我們不必要也不能單純依靠個體的幻想（Nussbaum,2010：9）。

但 Martha Nussbaum 認為要主張文學想像對公共生活的助益，必須先面對三種反對意見：非科學（unscientific）、非理性（irrational）與非相關。Martha Nussbaum 是這樣回應反對意見的，首先，文學與藝術之所以對於培育公民有其重要性，那是因為「公民所做的選擇，能夠而且應該表達出他們的判斷與感覺，而這種判斷與感覺的能力，正是由藝術培養的。...文學有尤其豐富的貢獻，因為它能夠表現出各種不同人之獨特的環境和問題。」（Nussbaum,2010b:108），對 Martha Nussbaum 來說，文學作品可以揭露「社會的階層化和不正義、操縱和利用」，使隱形變成透明，避免拒絕理解人與人之間的共同人性（Nussbaum,2010b:108），因此敘事想像的目的適於培養「同情」（compassion）的公民德行，一種設身處地的感受與理解到自己也會面臨苦難的可能性（Nussbaum,2010b:114-121），或者說「承認與接納」（Nussbaum,2010b:121），因為文學會用一種冒犯或「挑戰傳統的智慧與價值」的方式來進行敘事（Nussbaum,2010b:123）。

Martha Nussbaum 認為：

敘事的想像是道德互動的主要準備。神入和推想的習慣，會產生某種公民和某種形式的社群：它會培養對他人需要的同情的回應，也理解環境是如何塑造這些需要的，但是同時也尊重分離與隱私。這是因為，文學的想像不僅讓人加緊注意了主角的命運，並且也把這些主角界定為有著豐富內在生命、不能一窺其全貌的。（Nussbaum, 2010b:113）

但是同情並非意味著「不加批判的理解」，文學內容必然偏重或強調某種單一議題的描寫，我們必須理解到這種歷史眼界的限制，同時進行同情的閱讀與批判的閱讀（Nussbaum,2010b:126-127）。為了不流於相對主義的窠臼，文學的教授最好要有哲學的輔助來進行自我批判，但對 Martha Nussbaum 來說，這還不是最需要擔心的，因為對文學想像力的培養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質疑同情的可能性，懷疑一個人有可能經由同情而脫離其所屬的團體，懷疑有共同的人類需要和利益，可以作為同情的基礎」，這種挑戰來自於「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身份是由其所屬的社群身份來決定，因此用一種不批判的態度來肯定「差異」（difference），從而使得跨越文化、性別與族群背景去理解其他人變成不可能，更談不上透過文學培養同情心與想像力，因此 Martha Nussbaum 認為「文學的政治允諾是：它能把我們帶到別人的生活裡，



而仍然不失為我，它能在我與他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間揭露相似性，但也能揭露差異，並使這種差異更能被理解，或至少更接近於理解。拒絕這種可能性，其實就拒絕了文學經驗住為一種人類之善的可能性。」(Nussbaum,2010b:138)

如果說世界公民的理想是 Martha Nussbaum 所謂人文教育的終極目標，顯然她必須先說明這種理想從何而來。於是她串連起了一個思想譜系關係：從古希臘犬儒學派的戴奧尼斯 (Diogenes)、斯多葛學派的西塞羅 (Cicero)，再透過潘恩 (Thomas Paine)、亞當斯密與康德，影響了美國建國諸父 (Founding Fathers)，甚至影響了詩人愛默生與文學家梭羅 (Thoreau)。戴奧尼斯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待當時約定俗成的習慣，Martha Nussbaum 認為這說明了「理性的生活必須用一種更為普遍的人類需要和渴望的觀點，來檢視一地的習俗與假設。」(Nussbaum,2010b:77)，而斯多葛學派的基本立場是「我們首先效忠的，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府，不是暫時的權力，而是所有人的人性所組成的道德社群」(Nussbaum,2010b:77)。這時候再透過蘇格拉底的思辨方式來質疑並反省自己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如斯多葛學派所說的，我們要學會尊重、承認與包容來取代憤怒、仇恨。

## 參、調和的可能

從第一節所討論史特勞斯自由教育理念可以得知，史特勞斯並非反對民主體制，反而是想以自由教育作為捍衛民主的機制，而對 Allan Bloom 來說，大學是民主與自由的基石。「自由民主體制在缺乏自由的大學的情況下，還能想像嗎？自由的大學顯然既是自由民主的最高表現，而且是其得以永續的一個條件 (The liberal university appears to be both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a condition of its perpetuation)。」(Bloom:2003:339)，而且：「民主國家中大學的存在，正是為了防止或治癒這種民主特有的盲目，這不是為了建立貴族政體，而是為了民主政體本身，為了保護這種制度中某些人的精神自由」(Bloom, 2007:207)。

他說：

民主制被看成特別需要大學的啟蒙作用，這既因為民主制必然有大量未受教育的統治者，又因為公共意見在民主制佔據著主導，而不再有貴族階層發揮平衡作用了，該階層本可以整合不同的原則，異議者的修補意見本可以得到它的保護。大學的出現是將優秀與平等、理性與被統治者的同意結合起來的手段。(Bloom, 2003:329)



Allan Bloom 甚至認為：「大學的活動有一條簡單的規則：它不必致力於向學生提供民主社會中可以得到的經驗？。他們不管怎樣總會得到這樣的經驗。它必須向學生提供他們在民主社會中得不到的經驗。」(Bloom, 2007:211)。

根據 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的著作看來，兩人的理論差異包括「理性與感性」、「菁英與大眾」與「哲學與文學」等，而這些區分之間彼此有其內在關連：例如 Allan Bloom 所捍衛的是起源於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哲學傳統，這個開端於蘇格拉底的傳統所強調的是理性，但並非啓蒙之後的理性，反而 Allan Bloom 以及其所承繼的史特勞斯學派，認為啓蒙理性所帶來的現代性潮流，正好是摧毀這整個古典哲學傳統的最主要力量。相對地，雖然 Martha Nussbaum 原本的專業學術背景也是古希臘羅馬哲學，但她的理論關注主要是呈現在古典文學中的情感面向。但是將焦點放在文學作品上，必然會鬆動某種作品的經典地位，如果經典像 Judith Frank 所說的只是「一個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不受人類關心所污染的崇高實體。」(Nussbaum,2010b：132)，但這並不是說 Martha Nussbaum 放棄了哲學，她在討論蘇格拉底哲學的正面作用時，提到：「當今學院中危害最深的，就是那種放棄追求真理與客觀性的傾向了，彷彿這些目標已經不再能指引我們似的。」(Nussbaum,2010b：56)

然而 Martha Nussbaum 與 Allan Bloom 立場的差距主要來自於對蘇格拉底的理解不同所致。對 Bloom 來說，蘇格拉底所施行的教育就是 Martha Nussbaum 所謂的「召喚被挑選出來的少數去過一種沈思的生活」(the calling of a select few to a life of theoretical contemplation) (Nussbaum,2010b：45)，其在政治上的結果就是「反民主的政治菁英主義」(antidemocratic political elitism) (Nussbaum:2010b：26)，這是因為 Martha Nussbaum 區分了「歷史上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哲學觀點」，而對 Allan Bloom 來說，柏拉圖在對話錄中所描述的蘇格拉底就是真正的蘇格拉底，因此本文第二節中 Martha Nussbaum 所整理出來的蘇格拉底四種教育重要原則，都是針對 Allan Bloom 所理解的蘇格拉底哲學所提出的對立觀點，特別是批判 Allan Bloom 這樣的觀點：認為哲學教育是少數人的特權，而只有少數菁英才可以用某種解讀經典這種權威文本的方式，來理解到偉大思想家的思想真義。

如果借用美國哲學家羅遜 (Richard Rorty) 的「民主優先於哲學」的概念，就某種意義上說，Martha Nussbaum 也是這樣認為的，但相對地，Allan Bloom 的觀點比較偏向「哲學優先於民主」，換句話說，民主必須由哲學來引導。如果我們將 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分別稱為「菁英論」與「民主論」，那這兩種看似矛盾而難以調和的兩種立場，是具有內在的不協調性格？還是這些只是看到同一問題的兩種面向？



筆者認為與 Allan Bloom 同屬於史特勞斯學派的 Matthew Crawford，於其著作《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一書中（註 5），所提出的主張使得 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看似南轅北轍的兩種立場，有了調和的可能性。Matthew Crawford 企圖提示我們已經遺忘許久的基本能力：「一個不受時間限制，卻與今天格格不入的理想：手工能力，以及對這個人造、物質世界的態度」（Crawford,2010:10），他想要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實作的能力與經驗到底在現代社會中還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他寫作該書的意圖在於：

本書偏重在做東西和修東西的經驗，而比較不關心經濟學。我還要思考，當這種經驗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褪去時，會造成什麼樣的損失。對人類未來的繁衍，會帶來什麼影響。使用工具，是否滿足了人類天性上的某些永恆需求？...因此，本書一部份是文化上的辯論。我要釐清、進而質疑那些哄騙我們，讓我們接受遠離手工工作是無可避免、甚至是可取之事的假設源頭（Crawford, 2010:12）。

從上述引言可以得知，Matthew Crawford 的出發點與 Martha Nussbaum 是一致的：他們都反對某種經濟理性的思維方式，甚至 Matthew Crawford 這樣說：「康德學派宣稱，在一個嚴謹的論述中找到這個責任，但我沒有能力讀懂。相對的，和其他人團結在一起，是個正面的吸引力，類似愛。這不是抽象的命令，而是我們經常會有的體驗。和任何虛無飄渺的普世東西比起來，它的範圍必然比較小，也把我們的情感抓得比較緊。」（Crawford,2010:232），這樣的口吻，與 Martha Nussbaum 在《詩性正義》一書中對情感想像的關注如出一轍。當 Matthew Crawford 從芝加哥大學這個史特勞斯學派的大本營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發現體面的研究工作並不適合自己，反而開始接單修理古董摩托車，因為他發現「在從事手工工作時，相較於其他公認的『知識工作』，總是會感受到更大的行動力與能力，我企圖去瞭解這種感受...。也許，最令人訝異的是，我經常發現，手工工作涉及到更多的智慧」（Crawford,2010:13）。Matthew Crawford 從中所發現的工作「哲學」是：「有生產力的勞動才是所有繁榮的基礎」（Crawford,2010: 18），而為了形塑出這種哲學，必須「去思考理性的特質、個人行動力的狀況、認知的道德面和難以理解的社區理想」（Crawford,2010:229），因為我們必須面臨到一種新的工作情境，這個情境就是上述引言中所說的有限空間範圍，導致我們必須脫離來自遠方的某種控制形式，不管是全球化，還是普世人權（Crawford,2010:232-233），我們還要透過「道德想像力」去實際感受在傳統上不被認可的人，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卓越的古典貴族理想，試著把「從工作中累積經驗來自助而自足」當作目的本身，將工作本身當作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是值得追求的，因為他產生某種「內在興趣」，而不需要「外在獎賞」作為誘因（Crawford,2010:209-210, 223-225），而工作最後會提升到這樣的層次上：「我的工作把我放在一個特別的社群中，



我本身所關心的狹隘機械事物，記錄在一個更大的意義圈裡面；我所關心的東西是用來服侍一個活動，而我們看得出來，這個活動屬於美好生活的一部份。這個共同認識，大家未必講出來，卻是友誼的基礎，由實在的卓越影像所引導」（Crawford,2010:228）。這樣的工作哲學對於我們去思考博雅教育的目標究竟有什麼樣的啟發？我們可以從 Matthew Crawford 所謂的「在實作中思考」來說明這個問題。也就是說，Matthew Crawford 認為在實作時並非不作思考，而只從試誤當中去累積經驗，反而我們必須擁有一種綜合性知識去針對我們所面臨的具體與抽象問題作整體性的觀照（註6）（Crawford,2010:197-198）。

雖然表面上看來，Matthew Crawford 的這種工作哲學思考似乎與 Martha Nussbaum 著重當代多元社會的「民主論」較為契合，但是從上述兩段引文可以得知，教育的目標如果必須面對生活的種種課題與挑戰，解決這些問題無法只根據日常生活所累積的經驗，還必須根據以思考「美好生活」為生命終極目標，隨時浸淫在偉大心靈所呈現的經典之中，保持不斷的對話，來鑄鑄一種整全性的哲學觀點來對生命議題進行永恆的觀照。這樣一來，Allan Bloom 所倡議的哲君教育的「菁英論」觀點，反而成為當代大學教育的基礎核心。因此，Matthew Crawford 的觀點反而用一種新穎而另類的方式，將 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的兩種論點整合起來，而提出了一個大學教育的重要答案來：「面對當代的全球化社會，養成多元包容的世界公民精神固然重要，但對於各種變局的根本核心意義的掌握，就非哲學家的養成教育不足以因應各種深層的挑戰」，本文認為這就是 Matthew Crawford 這種論點的啟發與貢獻所在，也使得我們思考台灣未來的教育方向，特別是通識教育的目標，有了一個新的著力點。

## 結論

Allan Bloom 在反省美國 1960 年代當時大學民主化浪潮時所提出的評論，在今天的環境下聽起來或許有些刺耳，不過其中仍然有值得深思的地方，他說：「我大膽地說，過去四、五年間擴大學生參與的運動什麼也沒達成，只是滋生出對其作用的新要求、並導致學術水準的墮落、蠱惑人心的學說增加以及大學目的感的消失。」（Bloom,2003:332），當然這不是表示 Allan Bloom 不贊同民主體制，而是說大學作個原本作為強調思想自由的堡壘，如果變成一個隨時忌憚社會輿論批評而隨波逐流的職業訓練所，不但捍衛不了民主體制，反而可能成為摧毀民主價值的幫兇，我想這也不是 Martha Nussbaum 這樣的自由派學者所樂見。如果個人卓越與民主價值可以兼顧，這當然應該要成為我們努力的目標。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 Derek Bok 在《大學教了沒？》一書所提出的，大學教育的目標應該包括下列八項：一、培養良好的溝通能力；二、建立清晰的思辨能力；三、養成獨立的道德思考力；四、擁有積極參與的公民責任感；五、面對多元化生活的準備；六、迎接全球化社會及其衝擊；七、拓展廣泛的興趣；八、適當的就業準備。我們可以瞭解到這幾種心態的建立與基本能力的培養，顯然是現行大學通識博雅教育責無旁貸的目標。但是如何透過課程的規劃與進行，將這些基本能力具體被落實在各課程的學習歷程中，實際上是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但在考慮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將「大學教育的目標應該是什麼？」、「大學教育到底要培育出什麼樣的知識份子來？」這類的問題先想清楚。Allan Bloom 與 Martha Nussbaum 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給我們一個相當好的參照點。然而，這些思考只是個開端，未來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仍然必須提出我們自己的答案來，台灣現行高等教育的實踐經驗，給了我們思考這類問題的適當意識。



## 註釋

1. 甘陽對史特勞斯學派的重要主張的介紹，主要見於《政治哲人施特勞斯》一書，該文又成爲《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的導論，見該書第 5-86 頁。
2. Martha Nussbaum, "Undemocratic Vista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4, no.17 (5 November 1987):20-26.後刊於 Robert L Stone 所編輯 *Essays o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一書中。
3. 她所研究 15 所大學包括，聖羅倫斯大學、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內華達大學、麻州班特列學院、哈佛大學、田納西州貝爾蒙特學院、莫爾浩斯學院、斯貝曼學院、匹茲堡大學、藍道夫—梅肯學院、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斯貴普斯學院、聖母大學、楊百翰大學。
4. Nussbaum 的這種觀點與另一位美國著名的哲學家 Richard Rorty 有很多類似之處，特別是 Rorty 在《築就我們的國家》一書中所提出的所謂「文化左派」的觀念，就包括了 Walt Whitman 與 John Dewey。詳見 Rorty:2006:1-30。
5. 在 Crawford 這本書中譯本書背的書評中，Reiham Salam 提到「本書顯然是自《美國精神的封閉》之後，最令人信服的論述」，這種結論雖然誇張，不過可以從中瞭解到，這兩本書的核心議題確實有其內在的聯繫關係，而且也將兩位作者之間的學派隸屬關係點出來了。
6. Crawford 借用了 Michael Polanyi 的默會致知 (tacit knowledge) 來說明這種整全性知識。



## 參考書目

- 甘陽。2003。《政治哲人施特勞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布魯姆（Allan Bloom）。2003。《巨人與侏儒》，張輝編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 布魯姆（Allan Bloom）。2007。《美國精神的封閉》，戰旭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 江宜樺。2005a。〈從博雅到通識：大學教育理念的發展與現況〉，《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4 期，2005 年 9 月，頁 37-64。
- 江宜樺。2005b。〈公民的理念與公民的教育〉，《通識教育季刊》，第一卷第十二期，頁 27-44。
- 伯克（Derek Bok）。2008。《大學教了沒？》，張善楠譯，台北：天下文化。
- 施特勞斯（Leo Strauss）。2005。《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新店：左岸文化。
- 施特勞斯（Leo Strauss）。2010。《古今自由主義》，馬志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柯勞佛（Matthew B. Crawford）。2010。《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林茂昌譯，北縣：大塊文化。
- 莊世同。2005a。〈論人文精神與法理學教育〉，《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2 期，2005 年 3 月，頁 59-94。
- 莊世同。2005b。〈人文精神、守法意識與法治教育〉，《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5 期，2005 年 12 月，頁 89-130。
- 納思邦（Martha Nussbaum）。2007。《逃避人性》，方佳俊譯，台北：商周出版。
- 納思邦（Martha Nussbaum）。2010。《培育人文》，孫善豪譯，台北：政大出版社。
- 納思邦（Martha Nussbaum）。2010。《詩性正義》，丁曉東譯，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羅遜 (Richard Rorty)。2006。《築就我們的國家》，黃宗英譯，北京：三聯書店。

蔡英文。2011。(書評)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不為利潤—為什麼民主需要人文學科?] by Martha C. Nussbaum [瑪莎·拿斯朋]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台灣民主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2011年3月)。

Bloom, Allan. 1987.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Nussbaum, Martha. 1995. *Poetic Jus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Nussbaum, Martha. 1997. *Cultivating Huma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ussbaum, Martha. 2004. *Hiding From Human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ichard. 1998. *Achieving Our Count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one, Robert L. 1989. *Essays o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 **Philosopher-king or Democratic Citizen?: Two Ideas of Liberal Education**

**Wen-po,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hau University

## **Abstract**

his article explores two ideas of liberal education: Allan Bloom's "philosopher-king" and Martha Nussbaum's "democratic citizen." Both ideas are well-known in modern American university campus. But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Martha Nussbaum seem get more attention in the debate about what proper purpose of liberal education is. Leo Strauss was a pacemaker of Alllan Bloom about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Strauss thought that liberal education was a priviledge of the few talented, the potential philosopher, to be cultivated a philosopher-king if possible. Following his master Leo Strauss' ideal, Bloom criticized the present education in American have lost the soul of university. Bloom has argued we should educate the modern aritocracy in democratic society, by practicing the ideal of liberal education. Martha Nussbaum does not agree Bloom's elitist argument.

**Keywords : General Education, Liberal Education, Leo Strauss, Allan Bloom, Martha Nussbaum**

